

## 评点《儒林外史》的再回顾与再思考 ——作于《儒林外史》第四次批本面世之际

陈美林

· 陈美林 ·

**摘 要** 《儒林外史》批评 前后做了四次 历时二十五年。期间 学术界研究吴敬梓和《儒林外史》的成果颇多 促进作者的思考 乃联系数次批评 就批评的立意、文史互证、遗产继承以及注释、校勘等几个问题 略作探讨 并简述一己之见。

**关键词** 吴敬梓 《儒林外史》 夹批 回评

DOI:10.13674/j.cnki.32-1017/i.2015.01.002

自 1989 年 12 月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拙作《新批《儒林外史》》(下称《新批》)以后 近十年期间印刷七次(第七次印刷为 1998 年 2 月)。此后由北京新世界出版社于 2002 年 1 月出版第二次批评本《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下称《清批》);2009 年 2 月又由该社出版了第三次批评本(下称《清增》)。2014 年 8 月 则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套色本《陈批《儒林外史》》(下称《陈批》) 近日方见书 此可谓第四次批评本。百年前 商务印书馆曾出版张文虎(天目山樵)批评本 张氏终其一生批评《儒林外史》重要者有四次 拙批正与其批次数巧合。商务在出版天目山樵批本百年之后 又出版拙批 无异是以一种新的形态延续该馆的悠久历史 令人感佩。

拙批自 1989 年出版以来 也整整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二十余年来 海内外一些报刊发表有关评论拙批的文章不下数十篇 如《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香港《大公报》、新加坡《联合早报》、《中华读书报》、《文学遗产》、《文献》、《书与人》、《明清小说研究》、《对外大传播》、《世界》以及韩国《中国小说研究会报》;其它如《东南大学学报》、《南京农业大学学报》、《南京师范大学学报》、《古典文学知识》、《周末》等等报刊均有专文发表。特别是《中国图书评论》不仅有专文评论《新批》(1993 年 6 期) 还于 2002 年 10 期发表对

《清批》的评论文章。在此期间,笔者除在相关文章中偶或涉及拙批外,也先后发表了《“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运用传统形式整理〈儒林外史〉的回顾》和《〈儒林外史〉评点研究与实践的回顾与思考》<sup>①</sup>二文申述一己之见。但二十余年来作此“批”之经历与思考,非一、二文所可尽述,今于第四次批本出版之际,再就诸如批评的“立意”、文史可以互证但不可互代、是批判继承还是全盘接受以及注释、校勘与校对等问题,聊申己见,并借以纪念吴敬梓逝世260周年。

在作《新批》之前首先“立意”,目的在于“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sup>②</sup>,不借古喻今或以古刺今,紧紧扣住文本,不作借题发挥之语,只求发明原著精神所在。此为作批评之“底线”,历经四次批评,都努力守住这一“底线”。

犹记在作《新批》过程中,即有友人建议将作者在校园中的生活经历融入“批评”文中,必会引起“共鸣”。笔者自1953年大学毕业后即从事教学工作,至作《新批》的八十年代中期,已在土人中生活三十余年,并非不熟悉校园生活,但与自己作“新批”之初衷有违,未予采纳。至于以各类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当代创作,笔者虽十分爱读,但也不敢轻易下笔批评。上世纪九十年代,著名作家马瑞方教授出版之“新儒林长篇系列”《蓝眼睛、黑眼睛》、《天眼》、《感受四季》三部长篇小说先后赠我,读来饶有兴味,不时激起在下联想与同感,深佩其观察之深刻、描绘之细腻、批评之大胆,无异“是对知识界的全景扫描与深层透视,是现代校园的‘清明上河图’”<sup>③</sup>。对她的成就不止一次表示赞叹。可是见其在《感受四季》扉页上写道“请《儒林外史》研究权威陈美林教授批点《新儒林》”时,则不胜惶恐,并非由于对其所描写的生活陌生,而是由于笔者所处的环境,如果联系现实下笔,难免有人“对号入座”,则在下难免“无妄之灾”,乃于1999年5月承其邀请为其博士生马君主持论文答辩之际,当面向其陈请,免除此一“任务”。

不借古喻今,不以古刺今,并不等于脱离现实,远离社会。笔者撰写论文、作夹批回评,怎能离开自己生活的社会现实?只不过“就事论事”,就古代文学谈古代文学,不脱离文本而随意发挥,那是写杂文的途径。即如十年前,我在一年之内先后发表《论〈儒林外史〉中的势利描写》、《论〈儒林外史〉中的师生关系》等文<sup>④</sup>,都是有感而发,但文中只就《儒林外史》及相关古代文学作品中所叙写的情景进行研讨,而不涉及当代现实社会中之种种见闻。

笔者这一“立意”为何满子先生所道破,当“清批”出版之后,他便发表《伟大也要有人懂》的长篇书评<sup>⑤</sup>,说拙批中的“夹批大抵是阐发文情,以数语点评小说的笔法,发明叙述上的前后对应,有时也随文起义,表述评者的世态评论和文化评论。这些评者自己的见解也大抵限于对小说所描绘的时代的歷史范畴,并不引古喻今,这也可以看出评者严守前代评点派不离小说而旁鹜的家法,目的只在于为读者理解小说作引导”。作者这一“底线”并未曾向满子先生谈及,他的评说全然

是他阅读拙作的感受 因而也就是客观的品评。第三次批评、第四次批评,也都不违背这一“立意。”

## 二

正如满子先生所指出的,拙批“有时也随文起义,表述评者的世态评论和文化评论。这些评者自己的见解也大抵限于对小说所描绘的历史范围”。由于拙批先后出版至今已整整二十五年,学术界对《儒林外史》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因此在后来的几次评本中也就结合不同时期的有关成果作相应的评述。当然,这些文字都紧密联系文本,也大都是一己之见,只是笔者对《儒林外史》的解读;而读者对拙著、拙批之感受,则是读者的解读。至于不同时期、不同处境的读者,由于读《儒林外史》原著以及拙作而引发的联想和思考,则是不同作者的不同感受。此文仅就一己在作批评时的“立意”结合不同时期他人之评论略作申述而已。

先谈文史互证。文史互证,多年来颇受学人重视。笔者也认可这一治学途径,但同时也注意文史不可互代,艺术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是有区别的。在“新批”第一回叙及王冕时,笔者即写了一条夹批“王冕,历史上实有其人,以书画闻名于世。宋濂、朱彝尊等先后为之作传。惟《儒林外史》中之王冕乃作家所塑造之文学形象,不可处处以史实推求。”此后在第四十八回回评中论及王玉辉这一形象时,虽然指出其“所本”乃“汪洽闻父女事”,但同时根据小说所塑造的王玉辉形象,指出其“虽为迂儒,却亦有妄入心性”,并未将其与汪洽闻其人混同,又在《儒林外史人物论》一书中写有一篇《自称“迂拙”其实“伪妄”的老秀才王蕴》<sup>⑥</sup>。数年后读到一篇《王玉辉的悲剧世界》<sup>⑦</sup>的文章,该文根据何泽翰先生《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sup>⑧</sup>书中提供的汪洽闻的资料如金兆燕的诗、文等,与《儒林外史》中王玉辉这一艺术形象夹杂在一起分析,令人难以赞同。笔者便在《清增》的回评中仅就事论事加写几句“须要注意者,文木老人所细写之王玉辉父女事,绝不等同于汪洽闻父女事。以‘本事’去范围艺术形象本已不当,再引申做出王玉辉乃‘古君子’的评价,则更为荒谬矣。”何泽翰先生在1957年出版的该书“前言”中就已明确指出“如所周知,经过作家概括和典型化以后的艺术形象和原型之间有着巨大的区别,小说并非家谱和碑传,与历史上真人真事不会完全一样。”并且在该书“王玉辉”一节中,于提供有关汪洽闻资料后,特地说明“作者极意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 and 一般士大夫对于烈妇殉夫的态度,富有典型性,不一定真是烈妇汪氏这一幕所有的事。”对于“悲剧世界”一文的分析,不久也有文对王玉辉是否为“古君子”予以评析<sup>⑨</sup>,此不详论。

岂知混淆文、史二者的论文,于“悲剧世界”一文发表后的十余年又出现在某些学人笔下,在《〈儒林外史〉研究新世纪》<sup>⑩</sup>一书中,有一篇某博导所写的《读〈儒林外史〉札记》,针对笔者在三十五回回评中所指出的卢信侯因收藏《高青邱文

集》被祸一案时所说“这一文字狱案,亦非作者向壁虚构,而有其亲见亲闻有基础。其子吴烺所师事之学者刘著曾馆于文木老人至友程廷祚家,因其收藏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而为顾瑬诬陷下狱。刘著原籍湖北江夏,居江南九年,而被捕下狱‘前后七年,父死家破,几至刑戮’”(程廷祚《青溪文集续编·纪方舆纪要始末》)。此案发生时,吴敬梓已移家南京,对此案之经过知之甚详。《外史》所叙,必以此案为基础,参酌其它文字狱案,予以改写。”“札记”一文在简单排列《高青邱文集》案发生的时序后,针对拙批上述一段批语说,吴敬梓“信手写来,没有严格按照历史来写,出现了前后不一致的情况”。文学创作要“严格按照历史来写”,这种要求混淆了文学与史学的区别。须知,吴敬梓生活的时代,文字狱频频发生,康熙朝十余起,雍正朝二十余起,乾隆朝更达八十余起。在这种高压氛围下,作者岂能公开叙写发生在当代的文字狱案?只能假借前朝的某一案件来反映现实,“前后不一致”云云,正是作者运用的遮眼法,无异是暗示读者他不是写的前朝的高青邱一案,而是借此案来反映当前文字狱的恐怖气氛。对此,在第四次批本中,则略加数句,以强调文史不可混淆,夹杂而论。

与此案相关,“札记”作者在论及王惠此人时也做了令人不可思议的解读,让人感受到“札记”作者的理解水平。第八回书中写及王惠在逃窜途中,得到蘧公孙二百两赠银,于跪拜感谢之后说道“我除了行李被褥之外,一无所有,只有一个枕箱,内有残书几本。此时潜踪在外,虽这一点物件,也恐被人识破,惹起是非,如今将来交与世兄,我轻身更好逃窜了。”于此,笔者夹批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熟读《论语》之王进士却将‘是非’赠人。嫁祸于恩人,岂不有违圣贤之教。”“札记”作者指责“这一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认为王惠“把它送给蘧公孙是为了报答”;又说“书里写的只是与枕箱有关,而与《高青邱集诗话》无关”,还引用丫头双红所说“王太爷到浙江来,不知怎的,又说皇帝要他这个箱子……我想皇帝都想要的东西,不知值多少钱?”从而认为“这里没有一句涉及书,所以后来差人只要马二先生出钱赎了箱子,蘧公孙这场危机就化解了,丝毫没有提及《高青邱集诗话》”。因此,该文作者指责拙批所言“王惠将此书赠给蘧公孙后,公孙因此被告,用银了结”之语,是“没有文本的根据”。首先,王惠起初所言,说的是“物件”,而此物件则是装着残书的枕箱,并非专指箱子;其次,王惠事先明知此“物件”可能惹起“是非”,而后来果然引起“是非”,此举怎能说是“报答”?再说,丫头双红看重的是“箱子”,而家人宦成则认为“皇帝也未必是要他这个箱子,必有别的缘故。这箱子能值几文!”由此可见,“札记”作者的读书水平尚不及家人宦成!须知,在吴敬梓笔下,《高青邱集》一案,被写得扑朔迷离,似断若续,这是因其生活在以文字罪人的时代,如严格按照史实,集中叙写,怎能公诸于世!文木老人乃以高超之手段、过人之胆识,不断转换人物、时间、地点,创造出一幅文字狱的图景,反映当时以文

字罪人的恐怖气氛。因此,在第四次批本中,略加数语,着力强调文学不是历史。处处强调“文本”、求索史实,则难以揭示原著之精神所在。而过于看重“文本”者也难免将他人的“文本”当作自己的“文本”,将错误的“文本”当作正确的“文本”<sup>①</sup>。“札记”一文可议之处尚有,此不一一具论。

### 三

对于古代文学遗产应该是继承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不能无区别地全盘接受,甚至美化糟粕,这已成为共识。在1981年吴敬梓诞辰28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江苏省副省长、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汪海粟同志做为贵宾,在开幕式致辞中便说“吴敬梓毕竟是受正统儒家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不能不存在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的世界观中的消极因素,也不可能不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但这并不能掩盖他作品的思想光辉”<sup>②</sup>。

笔者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即将吴敬梓和《儒林外史》作为重点研究课题之一,在几十年的探索过程中,一直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无论是对其家史的求索还是对其作品的论析,无不以文献为根据,以史实为准绳,充分肯定其辉煌成就,也不隐讳其缺失。至于某些谈不上是“缺失”的问题,少数人硬是不承认事实,甚至为之掩饰,例如吴敬梓有着出嗣的经历,这根本谈不上是什么“缺失”,而考明这一事实,反有利于阐说其家产被夺之原因。吴敬梓生父为吴雯延,吴霖起只是他的嗣父。其父为吴雯延之说,前有程廷祚为敬梓之姊所写《金孺人墓志铭》所记为凭,其后有朱绪曾《金陵诗征》、陈作霖《金陵通传》所记可证。笔者于七十年代发表的《吴敬梓身世三考》对此做了清晰的考辨。即连不同意拙说的刘世德同志也不得不承认此说“为学术界多数人接受,在有关的论文和著作中几乎已成为趋向一致的固定的说法”<sup>③</sup>。不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采用拙说,即连刘世德任顾问、石昌渝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中之《儒林外史》条目,亦为石昌渝同志约请本人所写。但刘世德同志却独持异见,居然斥责朱绪曾、陈作霖“所知不多”。近代著名学者陈三立尊称陈作霖为“通儒”<sup>④</sup>,那么,刘世德同志必然“所知甚多”了,以致他在《金陵通传》中居然发现“里边有吴敬梓的传”<sup>⑤</sup>,笔者不禁在《吴敬梓生平文献资料的引用、解读和考辨》一文中问道“不知道刘世德同志从何种《金陵通传》中见到?”<sup>⑥</sup>文章发表已四年,未见刘世德同志有任何答复。岂料高峰论坛文集中刊有位退休副主任医师王恽忠者所写的三篇文章(在正式出版的《《儒林外史》研究新世纪》中则仅剩一篇),根据几块断碑残碣意图考证吴敬梓并无出嗣经历,文末并学舌似地引用刘世德“所知不多”的论断作结论。笔者真不知刘、王二人有否检阅过朱绪曾、陈作霖的著作,否则怎能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对于刘世德同志的文章和讲演,笔者已有文章答复,现不详论。对于自诩“天道酬勤”的王副主任医师的大作,原欲作文答辩,但有友人说不必与此种非学术性的文章

理论,此言有理。仅以吴氏后裔、退休教师吴其华对南京的一位记者所言“吴敬梓生有四个儿子,他是长子吴烺后人”,“吴敬梓生父名雯延,吴敬梓是他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自幼便过继给长房吴霖起为嗣”<sup>⑦</sup>,与拙作考定一致。笔者与吴其华同志从无联系,连吴敬梓后裔也不以其先人有出嗣经历为耻,何以不相干的人非要为其隐瞒、甚至改写其家史!

不仅“改写”还要“美化”。确实,早年的吴敬梓也颇以“门第高贵”自诩,但在“兄弟参商,宗族诟谇”,家产被夺之后,不免发出“君子之泽,斩于五世”的感叹,特别是无人为其主持公道,“淳于恭之自箠不见,陈太丘之家法难寻”,又感受到“至于眷恋乡人,与为游处,似以冰而致蝇,若以狸而致鼠”的炎凉,乃决心“逝将去汝”而移家金陵,“爰买数椽而居,遂有终焉之志”。上述所引《移家赋》之语,均表明其在家乡全椒的生活经历,逐步认识到世家大族内部之各种矛盾,也体验到全椒社会之彻骨势利,在定居南京、入籍上元之后,结交了科技学人、思想家、画家、诗人,又接触和结交一些市井小民,对平民生活有了切身的感受,从而思想有了改变,观念有了进步。笔者不讳言其不足,早年即发表《吴敬梓的门阀意识》<sup>⑧</sup>予以辨析论说,但对其后的进步则在相应的论著和批评中亦一再肯定。

在《〈儒林外史〉研究新世纪》中有一篇全椒县旅游局长田胜林所写《吴敬梓家世“从龙”和“让袭”考》,此文先行收入高峰论坛论文集中,作者除田胜林外,尚有夏清瑕,而公开出版时仅署田胜林一人。对拙作《吴敬梓家世杂考》<sup>⑨</sup>中第二节“所谓‘让袭’”一说提出不同意见。拙说先后被孟醒仁、陈汝衡所引用赞同,由于田胜林未曾见到拙作“杂考”一文,仅引用1990年出版之拙著《吴敬梓评传》,所以田文在引用孟、陈二先生文章后说“陈美林先生随后解释吴氏让袭之秘”云云,其实解释“让袭”实为“失袭”之说首先是笔者提出的,孟、陈所作均出版于拙文发表之后。田文认为吴敬梓先人“从龙”有功,因而于“永乐二年(1404),皇恩浩荡,欽与世禄”。至于渠为所谓“让袭”而提供的史料,恰恰说明其先人是冒名顶替入伍的,历代后人“有‘借职’、‘替职’,甚至还有‘革职’者,唯独不见‘让职’”。至于其它种种提法如“千户”为“正五品高级武官”云云,说明渠纯然不知明朝官制,而其所竭力美化之吴敬梓家史,实际上反倒揭露了吴氏家史上并不足称道的一面。虽然这并不影响对吴敬梓的正面评价,但也无以抬高其身价。对此,笔者已有专文《“让袭”小议》<sup>⑩</sup>发表,此处不具论。现仅就田文“从龙”一说略申己见。

《移家赋》中诚然有“远祖以永乐时从龙”之语,这只能表明中年移家南京之前、之初,吴敬梓思想中仍有程度不等的自诩门第出身的门阀意识,但在社会的生活实践中,此种意识观念已逐步淡化而有所改变。如果说追随朱棣起兵夺取建文帝位为“从龙”,那么朱棣在夺得皇位之后,其次子朱高煦又谋夺长兄之子朱瞻基皇位,但未能如乃父那样获得成功而被铜缸压顶活活烧死。那么,随从朱高煦举

兵者当为“从逆”之贼子了。其实,“从龙”也好,“从逆”也好,都是最高统治者内部争夺皇位之争,正如朱棣在夺取帝位以后斥责方孝孺所言“此朕家事”<sup>②</sup>也,只是成者为王败为寇罢了。在接触到一些思想家后,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就再没有什么“从龙”之语了,而是通过不同人物之口,对朱棣的作为有所批评,如第九回看坟人邹吉甫便说及其父所言“在洪武爷里过日子,各样都好,二斗米做酒,足有二十斤酒娘子。后来永乐爷掌了江山,不知怎样的,事事都改变了,二斗米只做出十五、六斤酒来”,笔者便在原先夹批文字前加写一句“草民从切身生活感受中之永乐皇帝”。至于杨执中所言“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就弄坏了”,则是与娄三、娄四一类的“科名蹭蹬”的士人的见解。对于杜慎卿所言永乐“振作”、建文“软弱”(第二十九回)云云,笔者则引用《明史·食货》所记“靖难兵起,淮以北鞠为茂草”以及《明史·成祖本纪》虽肯定永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但也指出其“倒行逆施,愆德亦曷可掩哉”等史料写入夹批中;而对建文“软弱”云云,则批道“建文在位仅四年,朝政得失,所有记载已为永乐毁灭无遗,‘软弱’一说尚需确证”。总之,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从不同角度评价了永乐,再无以其先人“从龙”之举自夸的言论,这无疑是一种进步。

再如“风水”问题,吴氏先人从吴谦开始,以至吴国鼎、吴国龙<sup>③</sup>等辈都有寻“吉址”、“佳域”安葬先人以求后代发达之举。吴敬梓三十岁所写的《减字木兰花》词中亦曾叹息“劬劳慈母,野屋荒棺抛露久。未卜牛眠,何日泅岗共一阡?”颇以未能如陶侃那样寻得一块吉地——“牛眠地”,像欧阳修那样将父母合葬于泅岗而感到愧疚。但在《儒林外史》中,这种思想观念已然改变,在第四十四回书中,通过迟衡山之口对这种迷信风水的言行大加挞伐,并在四十五回中对余敷、余殷寻风水的恶形恶状,又无情地予以辛辣嘲讽。笔者在该回之回评中充分肯定了文木老人思想之不断跃进。

凡此等等,不再缕述。总之,笔者在充分肯定吴敬梓的高度成就的同时,也不讳言其种种不足,这是生活在三百年前、出身于缙绅门第士人难以避免的,而对其在生活实践中的进步,也充分表而出之,予以肯定,力求对于优秀的文化遗产,以批判继承的原则加以弘扬。

#### 四

在四次批评过程中,还有几项工作,可略作申说。首先是校点问题,作《新批》时,先以没有标点的“卧本”为底本,自行标点,然后再参照有标点的近人整理本。所以《新批》之标点,有不同于他本之处。该书出版后,即有书评涉及《新批》此项工作<sup>④</sup>,此不详论。

其次是注释,《新批》交稿后,总编突然不要注释。费了很大精力所作的全部注释未能公开出版却已流传在外,颇令笔者忧心。因为注释与资料一样,一旦被

人挪用,很难说清是谁先作的注释,是谁先发现的资料。何泽翰先生在参加1984年于南京召开的纪念吴敬梓逝世230周年学术讨论会后,返湘之前,曾为其所著《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中之大量资料为人囊括而去又不说明<sup>②</sup>,极为不快。他与程千帆先生原很熟悉,恰好千帆先生是此次活动的委员之一,他便对千帆先生说及此事。因笔者也是委员之一,程先生也便对我说起,并表示在何著再版时当为之题签,以示对何泽翰先生在道义上的支持。

《新批》之大量注释既然外流,便又经数年努力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了全面修订,并大量增补。数年后,原在外文出版社文教编辑室任主任的周奎杰女士来南京公干,她原先曾将我改写的元杂剧出版了英、法、德文本,因而相识。来宁后告诉我,她已调往新世界出版社任总编,继续向我约稿。除继续改写优秀戏曲作品如《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出版中英文对照本外,当我提及《儒林外史》批评本时,她欣然接受,便于2002年1月出版了第二次批评本《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除对夹批回评作了修订外,又重写了前言,特别是大量的注释得以问世。何满子先生在《伟大也要有人懂》的书评中曾有一节文字专门述及《清批》之注释,说“小说中的成语、方言、俗谚、庾词,旧时的制度、名物、掌故等,都做了精当的诠释,引经据典,出语源、示例证。这都很费心力的,前人称之为‘水磨工夫’”,“这个评本注释的精善,在近几十年来出版的几部长篇小说经典新版本中,也是很见功力的”。在《用详尽今注诠释明清文化》为题的书评<sup>③</sup>中,则认为《清批》“不仅仅从语言学的角度为小说作注,还力图通过注释小说来诠释明清文化”,“注释与小说正文浑然一体”,从而“涵容的文化信息更为丰富、更为密集”。《清批》出版后又不断审阅,仍觉得尚可进一步完善。2004年9月,笔者在北京香山饭店参加学术活动之际,新世界出版社新领导张海鸥女士得悉,便在老领导周奎杰女士陪同下来香山相访,约我整理《桃花扇》,作为大中华文库之一种,出版汉英对照本(已于2009年1月出书),我便提及希望再次修改《清批》,新、老领导都表示支持,于是第三次批评本《清增》便于2009年2月见书,对周、张两位老总的支持,深表感谢。后因责任编辑调离,人事变动等因素,在合同期满一年后,商务印书馆文史室主任陈洁同志请示领导后表示愿意以套色出版,鉴于百年前该馆曾出版过天目山樵评本,乃欣然交付。当然,交付商务之前,又进行了一次修订,可谓第四次批评本。但社会在进步,新人正辈出,史料也有新发现,学术水平不断提高,审美意识因时、因人而异,对《儒林外史》的研究必将有新的成果面世,绝不会止于不佞所作的微不足道的工作。

再次,关于校对工作,由于拙批四次,每次出版时都重新排版,旧版之错虽改,重排中又可能产生新错。因此,每有新书出版,凡年青于不佞的同道以及弟子索取时,便提出一项要求:发现书中不妥之处以及印错之处,反馈给我。有人认真做



了,有人则未有任何反响。九十年代随我攻博之李君,曾得到在下六、七部赠书,当年并未指出书中之误,却在取得学位十余年后,增补为博士生导师的2011年写了一篇文章先请其他弟子送给我。其时,我因心脏病发住院治疗。出院次日,李君即来舍间当面“讨教”。此事谈过,李文发过,原也不必再提这一问题了。但此文在收入《〈儒林外史〉研究新世纪》时,李君特地加了“后记”,说笔者对其“所谈愚见,多有首肯”云云,则不得不稍加说明。当时因病后不宜多谈,只先对他能将1989年出版的《新批》中的印刷错误寻出来,又与2002年出版的《清批》对照,表示感谢。尽管有些印刷错误《清批》、《清增》中已经改正,但毕竟二十几年前出版的《新批》中确实存在,既然李君指出,当然表示感谢。其后,在他要求下,便对他的大作稍稍提了些意见,原题为《试论版本校勘视野中的陈批〈儒林外史〉》,文题中所指“版本”云云,正文中无一字提及,似乎落空,“校勘”云云,实际是“校对”,例如《新批》中第十一回有一处“观灯”,误排为“欢灯”,显为形近而误,李君为此引用小说前后文,写了七八百字,最后又说“检阅《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此处的‘欢’已改为‘观’,甚是。”诸如此类者,罗列十几例,成文近万言。为此,便对李君说,“校勘”与“校对”在其大文中引用的《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两部辞书中均有明确释义,不妨先将二者的语义弄清楚。因为李君大作之参考文献中并无一种有关校勘学的著作,也无任何其它典籍,无法与之谈校勘问题。不佞又在病后,不能多言,特别是深知李君之性格,不宜多谈。当年审阅其博士论文凡三次,仅为其改正错别字不下一、二十处,特别是将“床第”写成“床第”,连改三次,李君认为二者可通,不肯更正,还在办公室中大声咆哮,为赶来的领导制止,此事甚至惊动主管副校长。有此往事为鉴,更何况当年的博士已成为博导,而且年逾花甲,不佞怎能再如往年那样认真,只能听之任之了。但李文公开发表时已改题为《陈批〈儒林外史〉校勘得失浅探》,删去“版本”二字;所谓“校勘”的内容依旧,不知是渠分辨不清“校勘”与“校对”二者之不同,还是特地将“校对”上升至“校勘”来说事,只得任由李君自去说罢,但说不佞“多有首肯”则不能不加以说明。在此,笔者再次表明第四次批本新近见书,尚未及仔细阅读,其中亦难免有错,即如今年二月见书之《独断与考索》、《三读集》中已然发现有误,只能等再版时予以修正了。又如金和《儒林外史跋》中“宇宦”一词,在拙作《吴敬梓研究》及《吴敬梓评传》中引用时均不误;但在《吴敬梓和〈儒林外史〉》小册子中,则误为“宇宦”<sup>⑤</sup>。时隔十余年,这本小册子又重版,事先也未通知作者,“宇宦”之误依旧,这哪里是作者的“校勘”不力,只能说是“校对”工作不到位罢了。笔者多年以来出了一些论著,欢迎读者对不佞书中出现的问题继续提出校正。

最后,略述一下《新批》出版后之直接、间接的影响。当年徐柏容先生曾希望在下为推动这一形式的书评做些努力,我亦曾发表《重视小说评点的研究,促进小

说评点的繁荣》<sup>⑦</sup>。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著名作家高晓声曾来舍间索取《新批》,告我漓江出版社约请一些作家评点小说,请他作《三言精华》,该书于1994年8月出版后,承其见赠。高晓声在序中说“漓江出版社别出心裁,要我来选评《三言精华》,把文学评论家的工作让作家来做,有点出格”,但有创作经验、自有眼识的作家高晓声不怕“出格”,其批评中也颇有精到之语。漓江此举,也影响到其它出版社,1996年2月,陕西教育出版社来信,希望我主持一套古代小说的批评丛书,责任编辑高安同志并于5月来宁面谈,说该社领导十分重视,拟出套色版,并要做为重点书上市。在他再三敦促下,于7月为他们订出“凡例”,10月,我应北京师大陆善镇校长邀请赴京,住该校新松公寓,高安又偕同编辑室主任廖可洲同志赶赴京城,商定选题及作者,除拙批《儒林》入选外,举凡《红楼》、《三国》、《水浒》、《西游》等约定张、蔡、马、吴几位北京、上海、杭州、厦门的教授承担,而且都交来样稿。笔者建议由出版社直接与每位作者订合同。正当《水浒》、《西游》交稿后,该社总编突然改变主意,搁置此一计划,经数年交涉,该社以退赔了事。这项工作虽无结果,但确做过努力。除蔡君早几年病逝外,其余几位仍然健在,但也都是八十上下的老人了。回忆当年共同做过的努力,更令我珍惜拙批居然做了四次,特别要感谢支持过我的几家出版社的责编及老总,还有校对人员。

2014年10月31日

注:

① 前文见《古典文学知识》2004年3、4两期;后文见《重读经典》,天津出版社2009年7月。以上二文均收入拙作《独断与考索——〈儒林外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12月。

② 袁无涯《忠义水浒传全书发凡》,见《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全传》卷首。

③ 《天眼》提要语,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④ 前文见《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2期,后文见《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6期,二文均收入《独断与考索》一书。

⑤ 见《中华读书报》2002年3月27日。

⑥ 文发表于《淮海文汇》1996年4期,书则由中华书局于1998年5月出版。

⑦ 见《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

⑧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12月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再版。

⑨ 《〈儒林外史〉中王玉辉形象的生成和接受》,《东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⑩ 此书先题名为《中国儒林外史高峰论坛论文集》于2011年印出,后更改此名,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4月出版。

⑪ 此处略及“往事”以为证,不评论,欲知其详,可参见《光明日报》(2000年6

月15日)、《法制日报》(2000年7月28日)以及《中国文化报》(2009年7月28日)有关文章。

⑫ 汪海粟讲话,收入安徽纪念吴敬梓诞辰280周年委员会所编专刊《吴敬梓研究》中。

⑬ 《吴敬梓的父亲是谁》,见《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3辑。

⑭ 《碑传集补》卷五十三《江宁陈先生墓志铭》。

⑮ 见《刘世德学术演讲录》,线装书局2008年1月出版。

⑯ 见《明清小说研究》2010年第2期,收入《独断与考索》一书。

⑰ 见《南京晨报》2005年6月9日。

⑱ 见《明清小说研究》1986年第4期,收入《独断与考索》一书。

⑲ 见《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收入拙作《吴敬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8月)近又辑入《独断与考索》一书。

⑳ 见《寻根》2012年第5期,唯杂志上所刊有错行,请查拙作《独断与考索》所收。

㉑ 《明史·方孝孺传》。

㉒ 可参见康熙《全椒志》吴谦、吴国鼎、吴国龙传,以及李调元《制义科琐记》等史籍。拙作《吴敬梓评传》有关章节对此有所论说。

㉓ 《评陈美林〈新批儒林外史〉》,香港《大公报》1990年6月4日。

㉔ 可参见湖南师范大学出版之《中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3期刊登之《想望风流倍惆怅——评何泽翰先生对〈儒林外史〉史料学的贡献》一文。

㉕ 见《中国图书评论》2002年第10期。

㉖ 《吴敬梓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4年8月出版,《吴敬梓评传》由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吴敬梓和〈儒林外史〉》,由辽宁教育出版社于1992年10月第一次印,此次重印为2013年1月。

㉗ 见韩国《中国小说研究会报》35号(1998年9月)。

作者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倪惠颖